

Revisit 2015: Research on Ethical Anomie of Traditional Mainstream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Take the *Beijing News* Report on the Stampede on the Bund as an Example

Jing Ran Wu Yulan

Abstract: Journalists are not only practitioners and demonstrators of social morality, but also disseminators and guides of media ethics as social values. Through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2013-2020 Media Ethics Research Report, it is found that the indicators such as the subject, principle, problems, content and form of media ethics anomie have fluctuated great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5. Exploring the change logic, we can see that the media ethics anomie is not only under the control of its own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under the multiple control of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Bourdieu's field theor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 social background and individuals through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takes the field theor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the Bund stampede report of the *Beijing News*, which triggered the discussion on media ethics in 2015, as the research case, to explore the change logic of various indicators of media ethics issues around 2015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in the complex news field, that is, when the media cannot timely observe and reflect on the field chang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apital acquisition and loss, It is easy to cause media ethics events that affec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media and social harmony by still relying on habits to carry out news practice that lacks professional quality, deviates from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separates from cultural valu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governance reference for media ethics anomie.

Key words: Media ethics; Field theory; Mainstream media; The New *Beijing News* reported the stampede on the bund

作者简介：井然，兰州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生，主要从事传媒伦理、财经新闻研究；吴玉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实务与媒体发展研究。

文章引用：井然，吴玉兰. 重访2015：场域理论视域下媒体伦理失范研究——以《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为例 [J]. 中国新闻评论, 2022, 3 (4) : 30-42.

<https://doi.org/10.35534/cnr.0304004>

重访 2015：场域理论视域下 媒体伦理失范研究

——以《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为例

井 然 吴玉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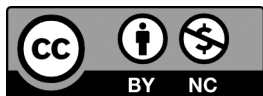
摘 要：新闻工作者既是社会道德的践行者与示范者，也是作为社会价值的传媒伦理的传播者与引导者。通过2013—2020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的内容分析发现，媒体伦理失范主体、失范原则、失范涉及问题、内容及形式等指标在2015年期间首次出现较大波动。探寻其间的变动逻辑，可以看出媒体伦理失范除自身专业建设不足外，也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控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注重透过研究主体继而勾勒宏观社会背景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以2015年引发传媒伦理讨论的《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为研究案例，探寻在复杂的新闻场域中，从宏观维度深刻地理解传媒伦理问题各项指标在2015年前后的变动逻辑，即当媒体不能及时对场域变动和相应资本的获得与流失进行观察与反思，仍然依凭惯习展开专业素养缺失、功能定位偏移、文化价值抽离的新闻实践，将容易引发影响媒体公信力与社会和谐的传媒伦理事件，以期对传媒伦理失范提供治理参考。

关键词：传媒伦理；场域理论；主流媒体；《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新闻工作者既是社会道德的践行者与示范者，也是作为社会价值的传媒伦理的传播者与引导者。传媒伦理作为一种“软约束”，以社会伦理道德为基础，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渐形成。

但转型中的中国传媒业在面对外界竞争时，有时并未将伦理道德与行动实践相统一，部分从业者屡屡触及职业道德底线，伦理道德失范严重影响传媒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损害传媒公信力。

有鉴于此，《新闻记者》从 2013 年开始梳理当年度中国传媒领域出现的伦理问题，形成《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报告旨在新型传播格局的总体话语框架下，通过讨论典型案例，理解中国传媒业现状和传媒伦理建设问题，进而凝聚行业共识、提高媒体自律。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将个体实践置于场域与资本、惯习之中，勾画了宏观社会背景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以 2015 年引发传媒伦理讨论的《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为研究案例，探寻在复杂的新闻场域中，从宏观维度深刻地理解传媒伦理问题各项指标在 2015 年前后的变动逻辑，即当媒体不能及时对场域变动和相应资本的获得与流失进行观察与反思时，仍然依凭惯习展开专业素养缺失、功能定位偏移、文化价值抽离的新闻实践，将容易引发影响媒体公信力与社会和谐的传媒伦理事件，以期对传媒伦理失范提供治理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分析与发现

2013—2020 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呈现了 8 年来传媒伦理问题的变动趋势，通过以失范主体、违反原则、涉及问题、报道内容、报道形式为指标的内容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媒体伦理失范除自身专业建设不足外，也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控制。

（一）商业狂欢：传播伦理问题社会化

根据《2018 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的伦理主体问题分析框架将传媒失范主体分为专业媒体、机构媒体、商业媒体、用户个人，^① 探讨传媒伦理在新传播格局下的变迁，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3—2020 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伦理失范主体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subjects of ethical anomie in the research report on media ethics from 2013 to 2020

年份	专业媒体	机构媒体	商业媒体	用户个人
2013	9	1	2	1
2014	9	0	1	0
2015	9	0	1	0
2016	6	2	3	0
2017	8	3	4	0
2018	8	0	3	0
2019	5	2	6	2
2020	7	3	7	4

①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王侠．2018 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 [J]．新闻记者，2019（1）．

由表 1 可见，2015 年后，专业媒体在伦理报告中出现的次数开始走低，以商业媒体为主的非专业媒体的出现频次上升，二者的此消彼长与互联网平台运用资本手段进入传媒产业密切相关。在商业的狂欢之下，传媒伦理问题呈现出社会化的趋势。

（二）真实第一性：人的尊严与暴力退潮

媒介伦理学者克里斯琴斯提出全球媒介伦理有三大“原生规范”^①——真实、人的尊严、非暴力。本研究将其视为违反伦理原则的具体指标，对文本内容进行梳理，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3—2020 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伦理失范原则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s of the principles of ethical anomie in the research report on media ethics from 2013 to 2020

年份	真实	人的尊严	非暴力
2013	6	4	1
2014	7	5	2
2015	8	3	1
2016	4	7	2
2017	7	6	1
2018	9	5	2
2019	7	6	5
2020	8	4	1

由表 2 可见，除 2015 年，违背人的尊严和真实原则波动较大，大多年份真实原则一直是被关注最多的伦理原则，人的尊严原则次之。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相较于传统格局下的传播，传播者受到的限制更少，传播者的职业素养可能更为欠缺。同时，其传播主体较少与传统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互动^②，而传播主体之外的社会群体又很难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做出道德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媒体时代的受众对假消息或谣言更敏感。

（三）问题多样化：从源头把关到信息捏造

有学者提出中国媒体存在 9 个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①，基于此对报告内容进行梳理，如表 3 所示。

① 宁丽丽. 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倡导与道德干预：对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的访谈[J]. 国际新闻界, 2017 (39).

② 燕道成. 新媒介伦理建构的基本维度：责任伦理[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 (44).

表 3 2013—2020 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伦理失范问题统计表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ethical anomie in the research report on media ethics from 2013 to 2020

年份	有偿新闻	捏造	报道痛苦和悲剧时的冷酷	性行为的过度披露	暗访和隐蔽的摄像头	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对抗	新闻来源	媒体暴力
2013	1	2	0	0	0	0	2	4
2014	1	1	1	0	1	0	5	1
2015	0	1	2	0	1	0	6	0
2016	0	3	1	1	0	0	3	1
2017	1	4	4	1	0	1	3	2
2018	1	3	2	1	0	1	4	4
2019	1	2	2	2	1	1	6	4
2020	0	6	2	1	0	1	1	0

由表 3 可见，最初，源头把关问题相对较多，但 2015 年之后，问题呈现多样化趋势，信息捏造等关系传媒内容全流程生产的问题均逐渐暴露。该问题既与大量非专业自媒体生产者借助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相关，又与传统主流媒体盲目追求发稿速度、迎合读者导致的把关缺位相关。

（四）话题转向：媒体专业能力失守

从报道内容划分，新闻可以分为财经、体育、科技、娱乐、地方、健康、教育、公益、环保、国际等，加入“广告”这一传媒内容，以此十个分类为基础进行报道内容梳理，如表 4 所示。

表 4 2013—2020 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新闻内容统计表

Table 4 Statistics of news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report on media ethics from 2013 to 2020

年份	财经	体育	科技	娱乐	地方	健康	教育	公益	国际	广告
2013	2	0	0	2	1	0	2	0	0	1
2014	2	1	0	2	0	2	2	0	1	0
2015	0	0	0	2	4	2	1	0	1	0
2016	1	1	1	2	2	2	0	0	1	0
2017	1	1	1	0	2	1	1	1	1	1
2018	0	0	0	1	1	1	4	0	2	0
2019	1	0	0	2	1	1	4	0	0	0
2020	1	0	0	1	3	2	0	0	1	1

由表 4 可见，健康、教育、娱乐与地方是传媒伦理问题内容中最常出现的话题，且话题各有特点。健康新闻方面，失实报道是引起传媒伦理问题的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以 2015 年为分界点，媒体的失实报道存在由凸显报道效果的夸张言辞（如 2015 年的“走私‘僵

尸肉’窜上餐桌”系列报道），向缺乏常识判断的转向（如 2016 年的《新安晚报》“丢肾门”事件、2020 年的“双黄连、板蓝根可治新冠”的报道）。教育新闻方面，对国内知名高校学生的调查类报道成为传媒伦理问题高发地，并以 2015 年左右为界，经历了对媒体调查报道合理性的讨论（如 2015 年的南都暗访高考替考报道），向调查报道是否全面客观的转向（如 2019 年的“不寒而栗的爱情”引发伦理争议）。娱乐新闻方面，媒体侵犯公众人物的隐私成为传媒伦理问题重灾区，并在 2015 年后，低俗化报道引发的伦理问题逐渐增加（如 2019 年的低俗文章推送凸显“新把关人”问题）。此外，地方新闻最初的传媒伦理问题讨论集中在地方媒体是否实现“公器”功能层面，在 2015 年之后，地方新闻引发的伦理问题明显增多，涉及伦理问题也逐渐多元。

（五）媒介迁移：技术普及下的人文关怀呼唤

从形式划分，我国新闻一般分为专题、滚动、评论、视频、图片等。基于上述分类，对 8 年以来的伦理报告进行梳理，如表 5 所示。

表 5 2013—2020《传媒伦理研究报告》新闻形式统计表

Table 5 Statistics of news forms of the research report on media ethics 2013 to 2020

年份	专题	滚动	评论	视频	图片
2013	5	1	0	2	2
2014	3	2	0	3	1
2015	5	3	0	1	1
2016	1	3	0	3	3
2017	1	1	1	6	1
2018	2	4	1	2	2
2019	0	5	1	4	0
2020	2	2	1	5	0

由表 5 可知，视频、图片类新闻报道所引发的传媒伦理问题在 2015 年以后迅速增长，这其中又以媒体对新闻当事人缺失人文关怀的问题居多（如 2015 年的外滩踩踏事件报道、2020 年“做寿老人下跪视频”引发双重反思）。这与我国网络带宽增加与移动设备普及密切相关，伴随信息传播速度的提高，更多传播内容能够进入公众讨论范围，而在这些内容中，虽然不乏对媒体专业水准的讨论，但从人的共情本能出发，前者的规模远不及对人性的关注。

基于 8 年来传媒伦理报告内容梳理后的相关研究指标呈现的 5 张表格数据整体比对后发现，2013 年以后，各项指标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首次出现较大波动，其中传媒伦理失范主体、

违反原则、涉及问题、新闻内容和形式出现了不同方向的转变，而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其中蕴含着底层逻辑的推进和演化——除内部操作失范外，媒体还经历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因而，面对这一转变，重访 2015《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考察其传媒伦理问题蕴含的深层变动逻辑，可以为日后的传媒伦理问题治理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2015 年《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的新闻伦理讨论

2014 年岁末，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事件，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复旦大学的女学生。第二天，《新京报》以“复旦 20 岁‘才女’外滩踩踏事故中遇难”为标题，引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个人信息及相关同学的采访，对逝者情况进行报道。随后，一些网媒转载其报道，并配以遇难者真实头像。当晚，复旦大学官方微博等平台发文呼吁媒体尊重逝者并保护其相关人员，勿再挖掘其隐私。

外滩踩踏事件报道，引发了一场全社会的新闻伦理讨论，此次传媒伦理事件也被《新闻记者》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梳理为 2015 年十起影响较大的传媒伦理案例之一。学界针对外滩踩踏事件报道，主要围绕隐私权、媒体建设、媒体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三个维度展开讨论与研究。

首先，对于媒体发布、转载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是否侵害隐私权的讨论，并针对满足公众知情权与保障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冲突问题进行延伸思考。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交媒体上的个人披露行为与媒体的信息披露行为存在巨大差异^①，媒体不能够随意加以引用或转载社交媒体的个人信息。同时，社交媒体传播基于特定的对象，而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存在“去语境化”。如果对个人隐私报道的目的是为满足公众知情权^②，则知情权必须与公共利益紧密联系，但也不能忽略站在报道对象和相关人员的立场上考量问题。在对外滩踩踏事件的报道中，《新京报》对逝者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信息进行了引用和传播，实质上已构成对逝者及相关人员隐私权的侵犯，而媒体所传播的内容与满足公众知情权也并无紧密联系。《新京报》于 2005 年就开辟了“逝者”专版，《南方周末》也有“讣闻报道”传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对逝者进行报道的经验，也不乏众多优秀的“讣闻报道”，但此次对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的报道明显有失水准。遗憾的是，相关学者在研究中对灾难性新闻如何报道进行了详细阐释，对传统主流媒体报道水准下滑原因

① 李朗，朱鹏．灾难性事件：对遇难者媒体呈现的反思——以《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杜宜骏的报道为例 [J]．新闻界，2015（6）．

② 陆晔，谢静，葛星，等．在满足知情权与消费遇难者之间——一场由“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新闻报道引发的学术讨论（即“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讨论）[J]．新闻与写作，2015（2）．

并无涉及。

其次，在对侵害隐私权的讨论基础上，学界对新闻媒体人文关怀的基本功能进行强调，要求媒体进行自律建设。童兵指出，涉及事件的报道应当坚守以人为本的原则。^①在对遇难者的报道中，媒体并没有站在遇难者父母的角度考虑问题，无疑对之造成了二次伤害。同时，学界对新闻媒体的问题与调查意识也抱有期待，并将之上升为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范畴。在《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中，除对遇难者隐私过度关注外，对事故发生原因等的调查丝毫未有涉及。陆晔认为，媒体作为社会公器，需从公共价值维度出发，对灾难事故的发生原因进行调查，对有关方进行问责。^②但相关研究仅停留在新闻专业主义立场的重构及人文关怀的呼吁，对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时代专业主义界限消逝的原因探讨不足。

再次，也有研究从关系视角出发，探讨网络环境下的媒体与公众、学者与媒体人的有效对话该如何开展。有学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业界可向公众解释信源及采写过程^③，进而加进彼此理解，在此过程中推动双方媒介素养的提高。同时，在敏感的传媒环境下，语境的多方考察、判断的善意也格外重要。通过媒体与外界关系的探讨，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媒体所处的生态位，但相关研究集中在事件报道后媒体如何弥合与其他主体的裂隙，对媒体报道时基于怎样的社会关系网络鲜有提及，且探讨的主体仅关照了媒体、公众、学者，更广泛的社会主体并未纳入考量。

最后，就该案例研究看，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于逝者的隐私及公众知情权等方面，未能从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分析媒体伦理失范的背景性因素。与此同时，从传媒伦理问题分析报告看出，自 2015 年以来媒体伦理失范问题更多地与这些宏观背景因素紧密地勾连在一起，但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研究报告都未能就宏观背景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因此，从新的视角出发透视媒体伦理失范就成为必须。

三、研究视角：场域理论的研究范式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场域理论，将个体实践置于场域与资本、惯习之中，该理论视角为透过研究主体进而勾勒宏观社会背景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研究路径。^④从新闻生产研究角度看，场域理论打破了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窠臼，既避免过度强调客观结构对行动者的决定性作用，又避免过度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新闻生产研究范式，

① 童兵. 人性·责任·自律——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新闻报道说开去[J]. 新闻与写作, 2015(2).

② 陆晔, 谢静, 葛星, 等. 在满足知情权与消费遇难者之间——一场由“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新闻报道引发的学术讨论(即“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讨论)[J]. 新闻与写作, 2015(2).

③ 李健, 张国良. 外滩踩踏事件报道引发的新闻伦理讨论[J]. 新闻记者, 2015(2).

④ [美]戴维·斯沃茨. 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 陶东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17.

该生产范式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用“社会建构主义”^①的路径分析新闻生产，即不仅要关注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也要关注生产者的“反控制”，不仅要关注新闻生产的“常规”特征、也要关注新闻生产的“非常规”特征。

（一）场域

“场域”（Field），也可被译作“场”，20 世纪 60 年代，布尔迪厄将其运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在场域理论的普遍化运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场”是力量聚集的所在，被各种权力或资本占据着不同的位置，是实践者采取策略、争夺资源的空间，而实践者的策略又取决于其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掌握和分配情况。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有其自身的特征。^②首先，场域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其次，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任何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为其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

（二）惯习

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概念中，“惯习”是一组行为倾向，即习惯化的、实践性的、结构化的行为类型。惯习与场域的作用方式一是制约的关系^③，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二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成一个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因而，场域的运行规则形成是一种内在性外在化的过程，即外在客观条件以惯习发挥作用后的结果影响惯习。但场域和惯习之间不是简单地“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一种以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

（三）资本

在场域争斗中，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对其能否获得权力至关重要。布尔迪厄的“资本”是广义的资本概念，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④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经济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文化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它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社会资本以社会义务组成，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它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

① 张志安. 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生产惯习——以《南方都市报》为个案的研究[J]. 新闻大学, 2010(4).

② 李艳培. 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研究综述[J]. 决策&信息, 2008(6).

③ 罗德尼·本森, 韩纲. 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3(1).

④ 张斌. 场域理论与媒介研究——一个新研究范式的学术史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12).

场域理论强调实践者如何在特定的场域中，通过对各种资本的争夺和运用，形成一套包含情绪、语言、倾向等在内的一系列行为机制（惯习）。从场域角度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角度进行思考，实践即是资本、惯习及场域之间关系的结果。作为实践主体的媒介组织，其新闻生产向来受制于各种社会控制力量，其自主性也始终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控制的互动张力中方能生成。在中国的媒介场分析中，可以将政治资本^①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一起作为分析的要素，探讨传统主流媒体基于怎样的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惯习生产新闻，并进而探讨其中的资本争夺和转换过程。

可以看出，场域理论在立足新闻内部生产讨论的同时兼顾外部视角，有效地促进了宏观、微观控制因素在媒介组织这个中观层次上的勾连，从而为在宏观社会控制与微观新闻生产的范畴下研究新闻实践活动提供了可能，使得研究者在“关照个体的时候不至于忽略整体的变动，又能够在探讨场域结构变化时，不忘个体始终在进行的投资与博弈”^②，由此成为在研究变动着的领域时常用的一大理论资源。

四、重访《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2015年的资本与惯习变局

任何场域的自主性程度，与其在场域争斗中能够获得多少资本密切相关。分析中国的新闻场域，首先需要确定中国媒介场中的关键资本，其次才对媒介场的构型予以重视和分析。结合现实状况，中国新闻场域中的资本形式主要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四种。以《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为代表的传媒伦理事件，可以管窥主流媒体基于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惯习展开的新闻实践及其间的资本争夺和转换过程。

（一）政治资本的垄断引发专业缺失

政治资本的提出跟中国媒介的制度情境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政策供给端始终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道路，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场域。2002年，党的十六大厘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2003年至2005年，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推广；两年后，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在政策加持下，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国市场化的传媒产业基本实现了从“无”到“有”，传统媒体即进入“黄金时代”。接受政府领导的传统主流媒体，能够实现长期政治资本垄断^③，并通过政治资本实现经济资本的转换。

① 刘海龙. 媒介场理论的再发明：再思《关于电视》[J]. 当代传播, 2020(4).

② 唐铮, 林子璐, 严云依. 资本的转换与行动：场域理论视阈下的媒体人离职现象[J]. 新闻记者, 2022(5).

③ 刘海龙.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但主流媒体作为市场竞争的“业余选手”^①缺乏市场经验，其获得超额利润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传播工具、传播渠道等政治资源的垄断。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锻炼，缺失专业水准的操作惯例导致媒体新闻产品的品质产生不可避免的下降趋势。

2015 年《新京报》对外滩踩踏事件的遇难者进行人物特写报道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披露女孩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信息，如她男友的哀悼之词等，并以私信等多种方式联系受害者亲友。既没有尊重逝者的权利，也未考量象征权威的主流媒体所带来的伤害在网络时代的迅速蔓延。政治资本的富足使得《新京报》潜意识中带有一种权力的傲慢，也因此引发了报道在传媒伦理坚守中的专业缺失。

（二）经济资本的争夺导致技术追逐

主流媒体新闻场域中的经济资本主要体现为发行量、广告经营额及相匹配的盈利情况等具体指标上。但互联网平台的进入导致传媒市场的经济场域产生巨大变动，这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2015 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首次突破 50%，达到 50.3%；其次，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在 2015 年进入存量阶段，网民整体迁移至移动互联网时代^①。也因此，商业平台以国内网络与移动设备建设基础为前提，利用技术优势对经济场域不断施加影响，致使传统主流媒体的经济资本被不断侵蚀。

面对经济资本流失愈加严重的现状，传统主流媒体开始进行技术追逐。但技术升级引起的经济场域变动并非一蹴而就，于是传统主流媒体在试图从维权角度改变商业网站无偿、廉价使用新闻产品^②的现状，继而为在快速报道上获得优势，媒体既有的层层把关机制不得已做出让步。同时，媒体在争夺经济资本的过程中逐渐失去独立性，“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扭曲为对用户的盲目迎合，根据用户反馈所进行的新闻策划也存在着诸多隐患。

2015 年的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新京报》在 24 小时内就在网上发布了一篇不足 800 字的快讯，其中涉及外滩踩踏事件的内容仅 170 余字，其余部分均为受害一方个人信息的披露，甚至报道中还出现“新京报记者通过私信等多种方式联系王某，均未得到回复”的表述。《新京报》在未深入新闻事件采访就发稿，究其根本就在于经济资本追逐下导致的把关缺失和盲目迎合。借公众知情权来满足受众的情感消费，而非立足于媒体公共价值的调查和问责，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遂将《新京报》推上风口浪尖，传媒伦理遭到全社会的拷问。

（三）社会资本的流失带来定位偏移

满足公众知情权与保障公共利益是媒体获得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二者也共同构成媒体的

① 朱春阳. 垄断、创新与融合：新时期以来我国传媒业变革的基本路径 [J]. 新闻界, 2019 (10).

② 吴海民. “报业寒冬论”的提出及《京华时报》的命运 [J]. 中国报业, 2018 (15).

功能定位，作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社会资本与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以《新京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社会资本主要靠其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消息源、人脉关系、读者的构成类型等）来建立。随着以自媒体为代表的非专业媒体兴起，传统主流媒体主导下的社会资本开始流失。这主要表现在：以自媒体为代表的非专业化媒体借助社交平台的病毒式传播，通过发布煽情、猎奇的报道快速获得市场份额，部分公众由于缺乏较好的媒介素养，逐渐被不实新闻和极端观点左右，导致公众逐渐丧失与传统主流媒体的既有连接；同时，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公众讨论的兴起使得传统主流媒体的专业操作逐步由业界、学界的局部探讨进入公众话语。面对公众成熟讨论时代尚未到来、媒体专业性不足的现状，主流媒体的市场份额被严重侵蚀，其定位也逐渐在社会资本的流失中开始偏移。

《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定位在公众知情权的满足，却牺牲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且报道也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灾难问责，调查报道的缺位使公共利益的保障无从谈起。在报道中，记者在细数受害者的生活经历后，还将受害者亲友沉重的哀悼词一并纳入报道范畴，且在报道末尾才草草提及“目前校方正在做相关排查”。总之，满足公众知情权和保障公共利益既是矛盾的也是同一的，二者在新闻生产操作中进行着动态博弈，而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不要顾此失彼是赢得媒体社会资本的关键所在。

（四）文化资本的缺失造成价值出走

主流媒体的文化资本主要由从业者的教育水平积累、媒体提出的口号和各类活动体现的传媒价值观组成，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从业者的实践。

21 世纪初的 10 年里，以《新京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通过不懈努力，在业界积累了广泛的文化认同和专业口碑。但在 2015 年，由于从业者的大量离职^①，新闻媒体的文化场域发生变动。2020 年，《新京报》旗下微博子账号“@ 新京报我们视频”因在部分报道尤其是涉北京疫情报道中存在言论误导问题被禁言。同年，《新京报》在其 2021 年度报纸征订广告中宣布缩减刊期，自 2021 年起仅于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出版。在此之前，报社已将专职负责报纸部门的职员缩减至 7 人，余下职员全数转入新媒体部门。

由于离职人员往往具备较好的个人能力与专业素质，相当一部分传媒人已在媒体行业打造出个人品牌，富有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出走导致传统媒体文化资本的巨大流失。同时，离职媒体人成了传统媒体价值体系的“反叛者”，根据离职媒体人的公开言论可以发现，传统媒体从业者

^① 胡沈明，胡琪萍．个体身份转换与行业规则的塌陷——以 2003—2016 年媒体人离职告白为例[J]．编辑之友，2016（12）．

在体制藩篱下并未寻找到实现新闻理想的合适路径^①，同时在日渐式微的经营业绩压力下，媒体人缺失职业精神的案例又屡见不鲜，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不满足散布在离职从业者话语里，这种背离对于媒体文化资本的积累更是雪上加霜。更致命的是，这种背离对尚在媒体的从业者及在校园里接受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学生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对公众来说，媒体应该秉持的传媒伦理的价值观，由于缺少专业传媒人的实践，传媒伦理的坚守也成了无本之木。

五、结语

借助场域理论分析 2015 年引发传媒伦理讨论的《新京报》外滩踩踏事件报道，可以从宏观维度深刻地理解传媒伦理问题各项指标在 2015 年前后的变动逻辑，并对传媒伦理失范提供治理参考。

首先，从场域理论视域看，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媒体应该坚守的政治资本，这种政治资本构成了获取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基础，当然政治资本的获得也必须以专业报道的输出为前提。因此主流媒体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恪守以人为本的原则，一方面切实尊重报道对象，在此基础上服务于公共利益，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另一方面要加强媒体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的培养，用他律和自律推动新闻从业队伍整体实力的提升。

其次，伴随政府与平台资本的双向运动，主流媒体需要认识到原先固有的经济垄断地位已然发生变迁，技术推动了传媒业市场化进程，但提供优质、及时的报道仍是媒体在市场中获得优势的第一要义，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需要加大技术投入，迭代更新已经难以产生效益的经营模式。

最后，主流媒体需重新审视自身与公众的关系，一方面，公众期待媒体以权威姿态代表其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媒体也应找准生态位，在传播技术普及化的今天，与其他传播主体共建平等交往模式，促成和谐有效的公共讨论，从而重新赢得主流媒体应有的社会资本优势和文化资本优势。

总之，主流媒体需要紧密关注不同场域的变动，进而在场域间的互动中考量场域内部的变动逻辑。把握技术这一核心变量，在技术迭代中洞见经济场域内的资本流动，在经济场域的扩张与收缩中预见政治场域的治理与调控，在政治与经济场域的对抗博弈中理解社会、文化场域的缓慢流变。在此基础上，反思审视自身惯习，并进行灵活调整，就能用专业的传媒伦理规范更好地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各种挑战。

^① 胡沈明，胡琪萍．个体身份转换与行业规则的塌陷——以 2003—2016 年媒体人离职告白为例[J]．编辑之友，2016（12）．